

# 近代中国法治启蒙受阻原因探析

庞虎

(厦门大学 法学院,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法治启蒙是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由于脆弱的经济基础、腐朽的政治体制、落后的价值观念、恶劣的外部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它的作用并没有发挥到应有的程度。

[关键词]近代法治;启蒙运动;受阻原因

[中图分类号]D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478(2005)06-0078-02

作为政治危机的反应,法治思想以其前所未有的光芒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一大亮点。从梁廷楠对西方法治的介绍,到黄遵宪“权限”立法的提出,再到梁启超“法治主义”的宣扬,乃至孙中山“王权宪法”的构建,掀起了近代中国启蒙思潮的新波澜。然而,近代法治启蒙的进程却异常艰难。它并没有广泛深入人心,也没有转化为真正的建设实践,而是伴随着一次次尝试的失败而迅速夭折。究其原因,主要决定于以下方面:

## 1. 法治启蒙的经济基础相当脆弱。

“法治总是与商品经济相关,而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和以国家垄断为内容的产品经济无关。”<sup>[1]</sup>(P159)可以说,只有当市场经济发展到相当程度,固有的宗族、亲情根本无法调整商品交换过程中的利益冲突之时,法律仲裁才能被人们视为最合理、最确定的裁决方式。进一步说,也只有商品经济相当发达,社会的中产化程度日益提高,民间社会对政府的监督成为事实,商品交换的平等原则才能最大限度地剥夺官僚阶层的政治特权,也才能摆脱人治,最终实现法律仲裁的公开和公正。

但是在近代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受到严重阻碍,主要表现在:其一,市场环境的恶化。帝国主义的“分而治之”和封建军阀的军事割据使近代中国战乱不断,帝国主义侵略战争、农民造反战争、北洋军阀战争、国民党新旧军阀战争等等相互联结、彼此交织,就其持续性、频繁性和危害性而言,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时期。连年的战乱严重破坏了经济发展的安定局面,阻碍了统一市场的形成,使中国近代经济陷入极其恶劣的境地。其二,货币流通的混乱。近代中国,各大政治势力纷纷铸造钱币,搜刮民财。即使民国时期废两改元和法币政策的推行在统一币值方面有过重大意义,但由于通货膨胀的恶性发展,终于导致了货币信用危机的爆发。混乱的货币流通使商

品经济难以正常运行。其三,官僚权力的渗透。从“官办”企业的建立到“官僚资本”的形成,近代中国的经济发展始终未能摆脱官僚权力的剥夺和控制。豪门显贵们利用手中的权力巧取豪夺、横征暴敛,大大小小的家族公司比比皆是。政治权力的超额剥削,从根本上背离了公平竞争的市场原则,为商品经济的运行设置了严重障碍。其四,民族工业的萎缩。上述各因素的综合作用最终使民族工业处于崩溃边缘。在这种条件下发生的法治思想的启蒙,并没有与旧势力彻底斗争的经济依托,也缺乏欧洲式“精神个性”生成的商业文化背景,因此表现出明显的脆弱性。

## 2. 法治启蒙缺少民主制度作保障。

作为“优于一人之治”<sup>[2]</sup>(P168)的法治是专制的对立物,而与民主相辅相成,密不可分。其中,民主是法治的前提,占据首要地位,如果没有民主作基础,法治也就虚有其表而成为“人治”的代名词。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的“民主”不是“换汤不换药”的维新变法,也不是“挂羊头卖狗肉”的虚假共和,而是一种具体的国家制度。在这一制度下,“最强有力的决策者中大多数是通过公平、诚实、定期的选举产生的,并且在这样的选举中候选人可以自由地竞争选票,并且实际上每个成年公民都有投票权”。<sup>[3]</sup>(P6)这是法治启蒙所必需的政治基础。

但是在近代中国,戊戌变法和清末新政由于复杂的原因,没能建立起民主制度。辛亥革命可以说是中华民族历史命运的一次重大转折,它的具体标志就是南京临时参议院、临时约法和临时政府的成立。然而,由四十几个参议员组成的南京临时参议院,由简单法律条文构成的甚至孙中山本人都不满意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匆忙建立起来的五方杂处的南京临时政府,使得辛亥时期的民主体制从一开始就潜伏着失败的危机。袁世凯一上台就千方百计地攫取权力,废除议会和临时约法,从此,中国陷

[收稿日期]2005-04-20

[作者简介]庞虎(1978-),男,山东茌平人,厦门大学法学院讲师,在读博士研究生,专业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入长期的分裂、战争和无政府状态之中。随后,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虽然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但从此又开始了长达 20 余年的“训政”制度。这一制度所体现的是近代西方民主词藻掩饰下中国传统皇权政体与法西斯主义的结合,表现出更加显明的政治绝对主义和极端专制主义色彩。因此,近代法治建设所必需的民主政体始终未能形成。

### 3. 法治启蒙的社会价值系统没有形成。

任何重大的社会变革都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是经济、政治、文化等各因素紧密联结的互动过程。其中,价值观念问题又是整个系统中最具有先导性、决定性的关键环节。尤其对于民主法治传统相对匮乏的近代中国来说,法治的建立更离不开意识形态的更新和思想观念的升华。并且,新型社会价值系统的创立比经济、政治制度的变革更加复杂和艰巨,它并不是对旧传统的简单背叛,也不是少数“先知先觉”者的空洞呐喊,而是一场思维方式的深刻革命和社会文明的重新整合。只有以普遍民智为基础的全民族思想解放的真正实现,自由平等意识、权利义务观念、民主法治原则等新型价值形态才能广泛深入人心,法治化进程才能顺利推进。

近代中国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人们在奋起抗争的同时,也敏锐地觉察到了中西之间的巨大落差,引发了对西方文化的向往和狂热,力图通过引进西方文明来启发中华民族的觉醒。一时间,外来文化纷涌而至,思想界异常“繁荣”。然而,正如当年胡秋原先生所说,一个很容易接受外来思想的国家,在某种意义上也未尝不是这种思想扩大深入的阻碍物。被盲目崇拜的异国文化并未普遍渗透到社会各阶层的心理深处,甚至在知识分子那里,西方学说仍表现为一种浮光掠影的游离状态,那么普遍民众更是得不到新思潮的恩惠。并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新思潮的论证还要到四书五经中寻找根据,还没有形成相对独立的文化体系作为启蒙运动的向导。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曾被认为是“推之世界而皆准,百世之俟圣人而不惑”的真理,但其理论的抽象性、片面性,始终无法找到合理运作的现实机制,而最终沦为反动独裁者的“合法”外衣。加上殖民文化的侵蚀、复古逆流攻击,新思潮的成果早已被破坏殆尽,民众仍然在封建残余中过着愚昧、盲从、迷信的生活,法治启蒙的阻力也就在所难免。

### 4. 法治启蒙的外部环境极其恶劣。

启蒙不是一时之举,也不可能一劳永逸。旧的观念作为长期实践的产物,一旦固定化为人们头脑中的传统积淀,就是“一种巨大的阻力,是历史的惰惰性”,<sup>[4]</sup>(P375)并不会因为启蒙运动的开展而立即消除。启蒙总是要经历一个由浅入深、由片面到全面的逐渐演化过程,最终实现传统性与现代性的新老交替和文化转型。正如康德所说,“公众只能是很缓慢

地获得启蒙。通过一场革命或许很可能推翻个人专制以及贪婪心和权势欲的压迫,但却绝不能实现思想方式的真正改革。”<sup>[5]</sup>(P24)思维变革的艰巨性决定了启蒙的渐进性。只有在一个和平稳定的环境下,思想启蒙才能呈波浪式前进、台阶式发展,一次比一次更深刻,作用更伟大,意义更深远,最终内化为法治化进程的持久动力。

然而,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的民族压迫是最大压迫,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由这一特殊的历史状况所决定,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可以说是“爱国主义运动”的别名。就其实质而言,无论历次启蒙运动的思想主题和表现形式如何,最终解决的都是民族问题,是启“救亡”之蒙。近代以来,大多数启蒙运动的倡导者同时也是救亡运动的领导者,这一客观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美国学者托马斯·哈定说:“当一种文化受到外力作用而不得不有所变化时,这种变化也只会达到不改变其基本结构和特征的程度和效果”。<sup>[6]</sup>(P44)帝国主义疯狂入侵所造成的恶劣形势,客观上要求包括启蒙运动在内的一切活动都必须以民族救亡为中心,甚至“具有批判意识的知识分子被指责损害民族自信,不够中国人的样子”。<sup>[7]</sup>(P12)这种状况下,法治很大程度上仅仅被当成是救亡的文化工具,而没有作为奋斗的终极目标;法治启蒙很大程度上是基于某种爱国责任,而没有作为社会发展的理想前景,其彻底推行的可能性也就随之降低。并且,民族危机的日益加深、社会局势的激烈动荡,也使得近代中国的启蒙运动从未有过像欧洲启蒙运动那样从容的步履,而总是仓促而就,即使是最优秀的启蒙思想家也来不及,并且也不可能短短几十年内,完成欧洲花费几百年才完成的启蒙运动,更不可能达到完美尽致的程度。

### 参考文献:

- [1] 张文显. 马克思主义法理学——理论与方法论[M]. 长春: 吉林大学出版社, 1993.
- [2] 亚里士多德. 政治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65.
- [3] Huntington, Samuel P. The Third Wave - Democratization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M]. 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91.
-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3)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 [5] (德) 康德. 历史理性批判文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0.
- [6] (美) 托马斯·哈定. 文化与进化[M]. 杭州: 浙江人民出版社, 1987.
- [7] (美) 薇拉·施瓦支. 中国的启蒙运动[M]. 太原: 山西人民出版社, 1989.

——责任编辑: 简 明